

# 浅析文化差异与英语写作\*

何芸<sup>1</sup>, 高永刚<sup>2</sup>, 黄波<sup>1</sup>

(1. 中国地质大学 研究生院; 2. 中国地质大学 外语系, 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 本文从文化差异的角度探讨了 中国学生英语写作在语篇模式和表达方式出现的问题, 同时指出了英语写作教学中强调跨文化交际意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关键词]** 英语写作; 文化差异; 语篇模式; 表达方式

**[中图分类号]** H3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8874 (2005) 01-0074-04

## 一、汉、英思维模式的差异对英语写作中语篇的影响

不同民族存在着共同的思维, 但思维模式、思维特征则迥然不同。写作是思维模式的集中表现, 人们如何认识世界, 如何用语言表达对世界的认识, 不同的民族有各自的特征, 这就是思维模式的差异。

### (一) 篇章结构——直线型与螺旋型

研究文化思维模式与写作关系的第一人 Robert. B. Kaplan 在其 1966 年发表的《跨文化教育的文化思维模式》一文中, 概括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 5 种类型的段落发展模式, 即英语的直线式 (linear)、闪语的平行并列式 (parallel coordination)、东方语言的间接式 (indirect)、拉丁语及俄语的枝蔓式 (digressive)。汉语被纳入了东方语言的螺旋型文化思维模式, 而英语则属于直线式<sup>[1]</sup>。对于 Kaplan 的假说, 中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的定性和定量研究。Scollon, Samovar and Porter, Tyler and Davies 认为北美的语篇模式属于演绎型, 它们把话题、观点、态度从一开始就引入文章, 然后用事实说明, 即先有主题句, 后接自然衔接的例证句, 而后结尾; 而东方语言的语篇则属归纳型, 先交代细节或举例说明, 然后逐渐引出结论, 最后以总结归纳结尾<sup>[2]</sup>。王墨希等通过对 180 篇题目为 Why is English Important to Scientists 的英语说明文的写作分析, 发现以往基本没有受过英语写作训练的学生有 3/4 采用曲折中前进的隐伏式语篇模式即归纳式语篇<sup>[3]</sup>。

针对中国学生中的英语初学者所使用的语篇模式不同于英语族人这一现象, 很多中外学者对其产

生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Kaplan 认为中国学生英语作文的螺旋型结构源于“八股文”, 但一些学者不以为然, 他们认为中国古代的“八股文”不能作为现代说明文的有效范例, 并从中国学生所熟悉的古汉语说明文中找出具有直线式发展特点的两段实例, 由此说明古汉语中也有典型的英语段落结构特征<sup>[4]</sup>, Ricento 也从古汉语说明文中挑出一段实例, 证明该段落的结构与英语写作规范格格不入<sup>[5]</sup>。这说明不能仅凭从中国古代说明文中挑选的一两个例子来判断今天中国学生的文章结构之总体安排是否与“八股文”有关。虽说“八股文”早已被摒弃, 不可能对现代中国学生的 L1 作文、L2 作文产生直接影响, 但其修辞原理和基础仍是中国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因而对中国学生的思维方式必然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

但当今对中国学生 L2 作文起直接影响作用的是他们在接受现代汉语教育过程中所形成的汉语写作习惯, 也就是说, 有关汉语写作质量优劣的标准或现代汉语写作教材中对汉语写作原理、技巧、体式的规定都会对中国学生英语作文语篇模式的选择具有直接影响作用。

汉语的文章章法对于整体篇章的设计、组织和处理可以概括为八个字: “文贵有变, 文不喜平”<sup>[6]</sup>。这说明汉语读者与英语读者的期望值不同: 英语读者希望文章的结构平铺直叙, 直截了当; 而对汉语读者而言, 变, 则读者有兴趣, 不平, 则文章生姿态。汉语写作的这种主张行文不必时时、处处均写与主旨有直接联系的内容, 而采用“若即若离”方式将某些内容做适当的灵活处理, 以避免篇章布局单调、死板的观点对中国学生英语写作的语

\* [收稿日期] 2004-10-08

[作者简介] 何芸 (1981-), 女, 湖南长沙人, 中国地质大学硕士研究生。

篇建构确有不小的影响。从根本上说，语篇组织能力问题在于思维本身，而思维的训练是复杂的，难以立杆见影。这一问题也同时说明，只注重语法，而忽视篇章的传统写作教学是本末倒置，英语写作教学中对因文化不同而产生的语篇差异问题应予以足够的重视。

### (二) 篇章主题——直抒己见与委婉暗示

杨振宁在《杨振宁访谈录》中说，“中国的文化是向模糊、朦胧及总体的方向上走，而西方的文化则是向准确和具体的方向上走。”国内外学者在研究中发现，中心思想模糊不清、模棱两可是中国学生英语写作中的主要问题之一。张在新等对包括英语专业和非英语专业在内的 200 名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进行作文测试，结果发现 59% 的作文没有主题思想<sup>[7]</sup>。

中国学生英语作文的这种“主题不鲜明”、“重点不突出”的现象或许与汉民族的文化心理与哲学思想有某种关联。在中国某高校教授英语写作的外籍教师 Ken Keobke 反映，中国人看问题往往从事物的正反两方面出发，采取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sup>[8]</sup>。所以写文章时爱搞平衡，既说优点，又说缺点；既指出好的一面，也指出坏的一面。何去何从，要由读者做出选择，而不明确提出自己的观点，因为只谈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会被认为走极端或不公允。依如此模式写成的英语作文在英语族人眼中其论点之模糊，结论之无力就可想而知了。

Hinds 也从语言类型的角度对中国学生在英语作文中的此种主题思想表达方式作出解释。他认为东方语言（汉语、日语、朝鲜语和泰语）依读者与作者相关责任，当属读者责任型（reader-responsibility）的语言——读者有责任通过添补必要的信息及过渡，理清上下文的关系，从而把看上去不相关的部分组成连贯的语篇，领会隐含于文中的、作者暗示的主题并得出自己的结论。作者的任务并不是清楚地交代主题，而是引发读者对从前未曾考虑的问题进行思考。Hinds 称这种风格为“延辞引出目的”语言。而英语则是作者责任型的语言——作者有责任给出读者期待的、表明文章连贯与一致的标志，并交代过渡陈述及文章的中心思想<sup>[9]</sup>。

在中国对社会影响较大的儒教、道教和佛教的哲学观都是讲究“悟性”和“言外之意”，而西方思维方式受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影响提倡逻辑推理。正是在这种不同的文化思维和民族心理的前提下，中国人不敢直抒己

见，而西方人则强调个人的看法。总之汉英写作中主题思想的暗示与明示，具有深厚的文化渊源，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写作习惯，不同的读者期待，思维方式以及民族的心理都在一定程度上起作用。

### (三) 篇章策略——朴实无华与华而不实

篇章策略（text strategy）是 Enkvist 提出的术语，指篇章生产者根据交际目的对组篇所作的总体决策和选择，是为一定的目的而对决策参项（decision parameters）所作的权衡<sup>[10]</sup>。在写作中，当篇章的构架及主题确定后，篇章的策略表现为作者采用何种论据和手段来实现交际目的。

我国学生英语作文中所使用的篇章策略与英语族人确有一定差异，正是由于这种差异与英语族人的期待不一致，甚至是大相径庭，使得中国学生英语作文的交际效果大大减低。主要问题表现为多主观论断（assertion）而少事实论据（proof）；多慷慨陈词而少逻辑推理；多成语典故而少个人创新。邓炎昌指出汉英说理性文章（如政论文、社论或讨论社会问题的文章）差异显著：英文以事实说话（let facts speak for themselves）；而汉语政论文则强调使用战斗性语言：we must（我们必须），we should/should not（我们应该/不该），it is absurd（…是荒谬的），resolutely demand（坚决要求…）等。而这却犯了英语论说文之大忌，感情诉诸。英语的说理论说文强调以理服人而节制情感（rational rather than emotional），因为读者对所读的东西本来就心存疑虑，若他们感到作者是在激动昂扬的状态下抒发和宣泄个人情感，自然会排斥作者的观点<sup>[11]</sup>。只有温和、理智和冷静的措词才令人信服。

中国学生英语作文的语篇策略除倾向于采用种种方式翻来覆去不断重复同一主题即多论断，少论据外，很多学者还发现中国学生的英语作文充塞成语、谚语、文学典故及名言警句等。Keobke 发现中国人写文章往往大量引用古人的话语或古代故事传说等以说明和印证文中的观点，外国人则多用现代的普通人经历来阐述自己的看法。

综上所述，在选择篇章策略上，中国学生倾向于堆积和重复论断、引用典故和权威、套用成语和谚语来实现篇章目的，即依赖传统和权威策略；英语族人则强调使用数据和细节、引述个人和常人经历，运用成语、习语则采用掐头去尾、添枝加叶的推陈出新策略。由此可见，中国学生在英语作文中引用典籍和习语与汉民族的文化心理及汉语写作习惯存在某种关联。

## 二、汉、英表达方式差异对中国学生英语写作的影响

### (一) 中国学生英语句子结构存在的问题

美国学者 Schachter 和 Rutherford 曾发现, 中国学生所犯的某些被动语态错误, 其实是其应用“主题(topic) + 述题(comment)”结构的结果, 是汉语影响所致。如:

(1) Chang's food (he) must make (it) in the kitchen of the restaurant, but Mary's food (he) could make (it) in his house.<sup>[12]</sup> (括号内单词为 Schachter 等添加)

汉语是一种注重主题的语言(topic prominent)。句子的基本结构不是“主语 + 谓语”, 而主要体现为主题与述题的关系。主题总是位于句首, 是说话人想要说明的对象, 述题紧接主题, 是对主题的具体阐述。汉语中, 主语往往不是至关重要的, 常可省略而不影响话语的语义解释<sup>[13]</sup>。如“电影(你)去不去看”, 其中“电影”为主题, 其余部分为述题, 主语“你”被省略。中国学生所写英语句子套用了汉语的“主题 + 述题”结构: 在例(1)中, Chang's food 和 Mary's food 是主题, 与谓语 must take 和 could take 实际并不存在主谓关系, 因为 must take 与 could take 的真正主语与其宾语通过上下文提供的背景已经很明了, 所以就被省略了。

此外, Schachter 和 Rutherford 还发现, 在中国学生的作文中, “there be”在句中出现的频率比其他国家的英语学习者高。其中不乏错误使用, 如:

(2) There were many new patriots in my country gathered together and established a new country.<sup>[12]</sup>

笔者也在学生作文中多次发现类似错句, 如:

(3) There is a saying said that there is a golden house in the bood.

例(2)、例(3)的错误产生于注重主题的语言对主题的限制, 即主题必须是确定或已知的, 如主题不确定或为非已知信息, 在汉语中, “有”就被用来引出主题, 如“有谣言说我们的教授要走了”。中国学生在碰到类似情况时, 就自然用英语的“有”——there be 来代替了。

笔者认为, 中国学生英语句子结构反映出的“主题 + 述题”的特点确实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汉语的影响, 但从更深层次说, 中国学生倾向于使用主题结构, 不管是在汉语中, 还是在英语中, 这都是中国传统整体思维模式的反映。中国人整体优先的思维方式强调整体概念, 也使语句的意义高度依

靠上下文关系, 突出句子在篇章中与上下文或语境的联系, 从而施事主体(即主语)可以蕴含在行为事件的主观表现中而不被视为句子构造的主要成分<sup>[14]</sup>, 以致常被省略。中国学生用英语写作时, 仍是以整体思维去构筑英语句子, 就产生了许多英语语法所不能认同的“主题 + 述题”结构。

### (二) 中国学生英语句子类型存在的问题

笔者曾对所教大学二年级学生的期中考试英语作文作过一项调查, 发现简单句约占 60.2%, 复合句约占 29.1%, 两者相差 31.1 个百分点。而笔者对《新概念英语》第三册所作的抽样调查显示, 英语为本族语者所写文章中, 简单句约占 43.6%, 复合句占 34.9%, 两者相差仅 8.7 个百分点。这让我们感到, 中国学生虽已学习英语多年, 仍然喜欢写简单句。当然写简单句本身没有什么错, 但学生在写作存在逻辑关系的各句时, 常常未能用一些过渡连接语(transitional words)适当地把这些句子连接起来, 而对于某些句子来说, 这些过渡连接语是必不可少的。如:

(4) You can talk with them, play with them and teach them knowledge. You can get a lot of happiness.

例 4 中两个简单句其实在意义上有一定的关联, 即教师的快乐来自于与学生的交流、相处。这句话可作如下修改:

(4a) You can talk with them, play with them and teach them knowledge, from which you can get a lot of happiness.

笔者在学生的作文中还发现很多逗号连接句(comma splices), 约占 3.9%, 如(划线单词 for 为笔者添加):

(5) Second, teaching is a challenge for you, for you should catch up with the latest information so that you can always qualify yourself for the career. 这种句子在英语中属病句, 但相应的汉语译文却是可以理解且正确的。中国学生英语作文中像这样可用却未用适当过渡连接词的句子还很多, 这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汉语意合的特点干扰所致。

中国哲学、艺术和语言注重的是心理时空, 尤其偏重于时间的逻辑事理性, 即使是空间, 也常常表现为流动的空间<sup>[15]</sup>。因此, 中国人在用语言表达一些较复杂的思想时, 往往按照动作发生的顺序, 或逻辑顺序, 逐步交代, 从而形成一种“流水句”式的时间型样态。例(4)中, 教师得到快乐是果, 与学生交流、相处是因, 按因在前, 果在后的逻辑顺序排列而未用任何连接词。另一方面, 中

国人重了悟不重形式论证, 强调直觉、普遍联系, 轻视分析, 这种思维方式也必然使中国人倾向于将语句的语意、语境、修辞、逻辑等都融铸一体, 所以在例(5)中, 因从教与不断学习、充实、挑战自己两者之间的必然关系已蕴含在上下文中, 明确表达这一关系的词, 如 for, 就被省略了。中国学生按照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来塑造英语语句, 从而丢弃了许多在他们看来并不影响意义表达的连接词。西方民族从古希腊开始就注重形式逻辑、抽象思维。人们用清晰的几何学方法来认识自然, 从理解到表达都渗透着理性因素。这些表现在英语句式上, 就是以限定动词为中心, 以主谓结构为主干, 通过大量反映形式关系的动词不定式、分词、介词、连词、关系代(副)词等把句子其他各个成分层层搭架, 由中心向外扩展的“空间型构造”<sup>[14]</sup>。中国学生如果不知道这点, 写出来的中式英语语句就会因缺少了显示语际关系、主次先后的连接词标记, 让重分析、重逻辑的西方人无法理解接受了。

### 三、启示

我们看到, 由于中国与西方不同的文化、思维方式使然, 中国人与西方人形成了相应的控制语言的模式。中国人受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几十年的教育熏陶, 无法也不可能完全摆脱这种根深蒂固的思维、写作惯性。即便是英文大家, 只要他成长于中国, 他所使用的英文就难免受汉文化的影响。如我国著名翻译家叶君健就曾向杨自俭教授承认, 他的英文小说里就有中国式英语<sup>[16]</sup>。邓炎昌、刘润清也在《语言与文化》一书中指出, 中国学生的英语作文读起来像从汉语翻译过来的, 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想方法不同<sup>[11]</sup>, 但有关此方面的研究对英语写作教学具有一定的启示:

1. 写作决不是单纯的词法、语法问题, 也不是简单的框架结构、段落安排问题, 而是交织着浓厚的社会文化观念的语言思维活动。

2. 借用汉语思维进行英语写作, 无论对英语水平高还是英语水平低的学生来说都是不可避免的客观存在。脱离汉语思维而直接采用英语来组句谋篇, 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达到这种境界之前, 引导他们如何通过排除英汉思维模式差异的负迁移而充分发挥正迁移来促进英语写作水平的迅速提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3. 中国学生英语作文中的某些错误并不是偶然和随意的, 是汉语文化中与伦理不同的修辞限制因素所致。这就要求写作教师应首先熟悉两种语

言、文化的差异, 并在教学中加强学生在写作中的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意识。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在英语写作中不只拘泥于一词一句的正确, 而更加注重文章的整体交际效果。

### [参考文献]

- [1] Kaplan, Robert. B. Cultural Thought Patterns [J].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Language Learning, 1996, (1691 - 20).
- [2] Scollon, R. Eight Legs and One Elbow. Stance and Structure in Chinese English Compositions [C]. Second North American Conference on Adult and Adolescent Literacy, Banff, 1991.
- [3] 王墨希等. 中国学生英语语篇思维模式调查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4, (1).
- [4] Mohan, B. A. and W. A - Y Lo. Academic writing and Chinese Students: Transfer and Developmental Factors [J]. TESOL Quarterly 19, 1987, (3).
- [5] Ricento, Thomas. Comments on Bernard A. Mohan and Winnie Au - Yeung Lo's Academic writing and Chinese Students: transfer and developmental factors [J]. TESOL Quarterly, 1986, (3).
- [6] 徐振宗. 汉语与写作 [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 [7] 张在新等. 我国英语写作教学中的主要问题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5, (4):
- [8] Ken Keobke, 张煤. 中国传统文化的负效应 - 中文作文法对英文作文法的影响 [J]. 国外外语教学, 1995, (3).
- [9] Hinds, J. Inductive. Deductive, Quasi-Inductive; Expository Writing in Japanese, Korean, Chinese, and Thai [A]. Coherence in Writing Research and Pedagogical Perspectives, 1990.
- [10] Enkvist, N. E. Some Aspects of Applications of Text Linguistics [A]. Linguistics Cognitive Learning and Language Teaching.
- [11] 邓炎昌, 刘润清. 语言与文化 - 英汉语言与文化对比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9.
- [12] Schachter, J. & W. Rutherford. Discourse Function and Language Transfer.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1.
- [13] 许余龙. 对比语言学概论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7.
- [14] 申小龙. 中国句型文化 [M].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
- [15] 顾喜祖. 语言与文化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6.
- [16] 谢之君. 中国英语: 跨文化语言交际中的干扰性变体 [J]. 现代外语, 1995, (4).

(责任编辑: 范玉芳)